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没有规则的世界就像

□文 洋

2026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时指出，没有规则的世界就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混乱、失序不可避免。公平正义是人心所向，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

十字路口是道路交汇的节点，是往来通行的通道。红绿灯是指挥通行的信号灯，是维系十字路口有序运转的规则载体。习近平总书记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比喻“没有规则的世界”，生动形象地指出国际规则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础，强调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强权即公理”的逻辑行不通、早就应该摒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没有改变，各国利益交融、命运相连，国际社会恰如十字路口。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制度的国家在此交汇，商品、资本、技术、人员跨国流动，各类全球性挑战跨域传导。世界各国都要在“十字路口”交汇互动，国际规则就是维系其正常运转的“红绿灯”。然而，这个“红绿灯”正遭到破坏，少数国家把单边意志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合意时亮灯、不合意时“闯红灯”，甚至试图拆掉“红绿灯”。现行国际机制的权威性遭到侵蚀，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遵守，安理会决议受到抵制，单边制裁等行径违反国际法、破坏国际秩序。个别大国瘫痪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滥用安全例外条款，正在侵蚀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国际规则应秉持公平正义，这是“红绿灯”的公信力所在。所谓公平正义，核心就是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对所有通行者一视同仁，国际规则的公平性体现在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国际争端都应通过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化解。

国际规则应坚持平等适用，“红绿灯”必须有约束力。所谓平等适用，就是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统一适用、不搞双重标准。“红绿灯”不能由少数人随意操控，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更不能按照自身利益随意切换信号。国际规则同样不是少数国家的“家规”，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不能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更不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只有规则对所有参与者平等适用，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才能真正发挥定分止争、维护秩序的重要作用。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能由少数路人私自设定，而必须基于公共通行准则、体现所有通行者的共同利益，国际规则的效力同样源于各国的平等参与和共同意志。当前的突出短板是现行国际机制全球南方代表性严重不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远未跟上这一变化，有必要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性，纠正不公。同时，国际立法必须确保各国平等参与，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立法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立法进程，反对在缺乏广泛共识的情况下强推立法，确保规则真正反映各国共同意愿、兼顾各方合理关切。

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依托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及区域次区域多边机制，在国际金融、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气候变化、贸易等重点领域加强沟通合作，积极凝聚共识，推动增强现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与有效性。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世界这座巨大的十字路口，始终离不开“红绿灯”的有序指引，只有各国共同维护公平正义、共同恪守规则约束、共同参与规则书写，才能摆脱混乱、失序，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从“文明蒙尘”到“文明自觉”

——读《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

□陈 晋

一部真正有分量的具有学理性的著述，往往不是读完了事，而是读完之后让人忍不住要追问一些问题。《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就是这样一部书。初看书名，似乎是一个宏大的问句；及至读完，才感到这问句背后凝聚着作者谢茂松多年的思考成果和人文情怀。我读后的突出感受是：作者对这个宏大命题的学理化研究，带着对中国道路、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切关联，试图在文明史的深层结构中回答一个时代性命题——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我从党史研究角度，谈一些体会。

近代中国的“文明蒙尘”与党的文明重建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用“蒙尘”概括近代中国的文明处境，极具穿透力。面对强敌侵入，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战败，而是拥有数千年连续文明的民族被推到亡国灭种边缘。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意义上的断裂危机。改朝换代是治乱循环中的政权更替，文明本身还在；而近代中国面临的，是文明主体性被侵蚀、文明连续性被切断的危险。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固然惨痛，但文明根脉尚在，假以时日仍可复兴；而“文明蒙尘”所揭示的，是文明赖以自立的精神根基、价值系统和历史叙事同时受到冲击，是“文明之为文明”的危机。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从起点上就不仅是政治革命，更包含文明重建。书中所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在建党初期就能找到精神基因。这个精神基因说明，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组织，而是承担着文明再造使命的政治力量。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越眼前利害的文化自觉和文明抱负；也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就对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怀抱着孜孜不倦的执着热情，去追寻、去实践、去创造。由此，党的历史不能仅仅在“党史”框架内理解，而应该在党的思想文化的“魂脉”与“根脉”相结合的文明史的大视野中去看。

中国共产党何以具有文明创造的能力

文明史的大视野对党史研究的启发在于，不仅要从政治、军事、经济这样的领域去解释党的成功，还要从文明、文化、思想理论的角度去解释。政治策略、军事斗争、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它们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取得革命胜利，而且建立起一套具有文明深度的制度秩序，并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原题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在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框架时就把文化作为底色，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新文化”。新中国成立时，绝大多数作家选择留下来参与文化建设，这在世界革命史上罕见。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文明方向，而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

书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这个判断值得重视。全书一以贯之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诠释。所谓“文明型政党”，我理解，就是说党的政治实践始终内含着文明关怀，党的制度创造始终指向一种新文明的建构，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扎根文明传统。这不是给党史加一层文化修饰，而是揭示党史深处的一条文明主线。抓住了这条主线，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比如为什么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党能够创造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具有中国气派的制度形式，为什么党能够提出“两个结合”并使之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才能得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两个结合”的深层逻辑：从外在“结合”到内在“激活”

书中核心框架是“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三位一体，实际是在回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传统的关系，究竟是外在“结合”，还是内在“激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激活”一词很关键。不是把两种东西拼在一起，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力量，唤醒了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资源——民本思想、天下情怀、修齐治平的实践智慧；反过来，中华文明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提供了深厚土壤。由此再进一步，该书不是简单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制度安排，而是理解为中华文明“可大可久之道”在现代条件下的展开。这里的关键在于，“结合”不是外在拼接，“激活”不是简单借用，而是真理力量与文明传统之间的相互唤醒、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因为扎根中华文明而获得中国气派，中华文明因为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现代形态。这种双向互动，正是“两个结合”最深层的逻辑。如果只看到“结合”而不看到“激活”，就容易把“两个结合”理解为两种东西的机械相加；只有看到“激活”，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结合能够产生新的文明形态，而不是简单的理论拼盘。



《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谢茂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尤其值得指出，该书对“子张之问”与“黄炎培之问”的对照阐释，是不乏新意的理论创见。黄炎培之问关乎政治秩序的治乱兴衰，子张之问关乎文明秩序的连续传承。作者把二者统一起来，指出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在于文明秩序，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扎根到中国文明德性政治与德性社会的深厚传统中。这个论证把“古今中西之争”置于文明史深层结构中加以破解，读来令人兴意盎然。我特别看重这一观点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只有放在文明史的大视野中，才能看出其深层含义；政治秩序问题，归根到底离不开文明秩序问题。把“两个答案”提升到文明秩序层面来理解，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文明传统的激活，二者在深层上是相通的。

方法论启示：“通识思维”与文明史大视野

我做党史文献工作几十年，越来越感到，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在文明史大视野中，其文明意义很自然地“脱颖而出”。作者提出的“通识思维”，即彻底打通古、今、中、西、马，贯通传统、现代、革命与社会主义，也是值得重视的。该书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不是从鸦片战争讲起，而是溯源至西周礼乐文明，揭示“家国天下一体、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作为底层文明结构；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不是简单地论述“第二个结合”命题，而是通过毛泽东对《论语》的创造性运用，给出具体学理路径。这种从书斋走向现实、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学术转化，正是本书具有现实关怀和理论穿透力的根源。

方法论上的打通，带来的是问题意识的提升：不再把古今中西看作彼此隔绝的板块，而是看作一个可以在文明史深层结构中相互贯通的整体。这对于党史研究、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本书的方法论启示，可能比它的一些具体结论还重要。因为它提示我们，研究党史、研究中国道路，需要一种更大的文明史视野，需要在“通”字上下功夫——通古今、通中西、通理论与实践。

从“充实”走向“光辉”：为“光辉”事业做理论准备

该书后记写道，作者曾为自己的一本学术自选集取名为“为了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充实”，成为文化大国、文明大国则是“光辉”。该书和其他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多少是在为“光辉”事业做理论准备。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创设的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不是对传统的断裂，而是对“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翻版，而是扎根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新文明形态；天下文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层结合，正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文明想象。从“充实”走向“光辉”，既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学术研究应当承担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书海泛舟

做学问不可丢失主体性

——哲学家楼宇烈的治学之道

□谢路军

楼宇烈（1934—2026年），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哲学、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教研工作，执教时间长达66年。楼宇烈是中国传统文化真诚、坚定的守护者和实践者。总结他的治学之道不只是追忆一位学者，更是为当代中国学人留存一份关于“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的精神遗产。

文化主体意识是治学的出发点。楼宇烈治学方法论的逻辑前提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他写了《不能丢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一文，其中的观点广泛传播，他强调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千万不可丢失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

楼宇烈的这一观点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文化心态的变迁。“洋务运动”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富国强兵，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了这条路走不通。之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受到猛烈冲击。在向外学习的这一过程中，我们慢慢迷失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意识。

楼宇烈认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最大的误区，就是用西方的概念框架剪裁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即把“哲学”仅仅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式的论证，把“宗教”仅仅理解为西方式的有神论体系，于是就得出中国哲学算不上哲学、中国文化缺少信仰的错误观点。这种自我矮化，在他看来是“出主而入奴”，是学术上的丧失根本。因此，楼宇烈主张一切文化交流都必须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真正的交流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自我，而不是以他者取代自我。他既反对全盘否定传统、盲目崇拜西方，也反对狭隘自大、排斥域外文明。真正的文化自信，是看清自己文化的长处，也能客观看见别人的优点。这一立场贯穿其学术生涯。1986年，在“西化即现代化”仍是主潮的年代，他在北大哲学系重建东方哲学教研室，为中国哲学的文化自觉与话语建构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楼宇烈认为，东西方文明体系底层逻辑本来就不一样，西方重视造物主、彼岸世界，而中国立足现实人生和修身立德；西方画追求写实复刻，而中国画重视意韵生动。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人云亦云。楼宇烈将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概括为整体关联、自然合理和动态平衡三大特点。他经常说，要辩证看待事物，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懂得事物的相互依存、动态转化。

在今天的“地球村时代”，文化主体意识很容易被淡化。楼宇烈明确指出要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倡导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对外开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守住自身主体。“文化自信”需要筑牢本土文化的根基。

深耕文献，打通学科壁垒。楼宇烈的治学之法植根于对古籍文献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和打通学科壁垒。他强调要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发展脉络，必须回到“根源性的思想典籍”。他把传统文化的入门书目概括为“三玄、四书、五经”，重视《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主张从这些经典入手，由源及流，而不是在二手转述和时髦理论上打转。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跟着楼宇烈老师读书，所读的第一部佛教经典是《异部宗轮论》，就是讲早期佛教分派的著作。他还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主持编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系统整理汉传佛教历代思想文献，20世纪90年代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几乎都用过这套资料，成为案头检索的必备书目。最能体现楼宇烈文献功力的是《王弼集校释》，该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历经20年孕育，1980年出版后被公认为王弼研究最权威的文本和魏晋玄学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楼宇烈反复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务必有综合的整体研究，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性地体会其深层的、内在的共同特性，也就是要“融会贯通，整体把握”。他自己的学术路径正是这种“通”的实践，他的研究始于魏晋玄学，走向儒、释、道，走向东方哲学，再走向中国艺术和传统医学。楼宇烈讲哲学不局限于单一学科框架，而是贯通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神学等诸多领域，他始终坚持文化本就是一个整体，文科和理科并不是天然割裂的。这种整体观也体现在他对读书的理解上。他常讲读书要活读书、读活书，反对把读书人变成刻板教条的书呆子。

楼宇烈的研究以“说理通透”为重要特征。他的“通透”是受了冯友兰的影响。冯友兰倡导做学问“既要深入，又要浅出”。深入，是让业内学者读来有新意，见他人未见之地；浅出，是让普通百姓、外行之人也能听懂学问里的道理。楼宇烈一生恪守此训。他反对学界两种弊病：一类学者故作高深，堆砌晦涩概念，把哲学变成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另一类浅尝辄止，流于俗套，毫无学术内核支撑。这种“通透”也体现在他对写作的要求上。他告诫学生文章“不要超过五千字”，随后补一句“《老子》才不过五千言”；他强调每篇文章都要有感而发，为文务求有不同于前人的学术心得，不求量多。

治学讲求人文精神。楼宇烈治学之旨是他对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判断，即“以人为本”。他认为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与西方相比最重要的特征。在他看来，中华文化历来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他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西周以来就在中国确立起来，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他研究佛教，也不把佛教仅仅视为宗教信仰，而是挖掘其中的人文精神，把论文集命名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他厘清佛教文化研究与宗教信仰的边界，正本清源，破除迷信流弊，为学界与教界搭建良性沟通的桥梁。“人文立本”不仅是一种学术判断，更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他晚年提炼并践行十六个字，即“敬天法祖、守礼尽伦、知足惜福、感恩图报”；谈到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方法，他归结为“诚敬”二字，所谓诚是诚实诚信，不自欺人；敬是敬畏，敬畏天地、敬畏祖先、尊敬他人。他认为当下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正在于“诚敬”的缺失。

楼宇烈常说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愉快。怎么才能精神愉快呢？他提出“三理说”，即生理、心理、哲理养生。他尤其提出哲理养生的重要性，指出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精神愉快就是美好的人生。他还谈到人生“三乐”，即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豁达的人生态度。楼宇烈还经常讲王夫之的“六然四看”，即“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处事断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怀”“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在他看来，儒释道给现代人的启示是儒家教人“拿得起”，担当责任；道家教人“看得开”，知足不攀比；佛家教人“放得下”，不内耗、不执念。这些中华文化里蕴含的人文精神不是书本上的古董，而是治愈现实焦虑的良药。

治学之道